

# 母婴关系：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伦理学探讨

肖 巍\*

**[摘要]**母婴关系是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交叉的一个关键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说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也可以展示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母婴关系不仅是人性的最原初形式,也是任何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母婴关系 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4-0090-08

在当代学术思潮中,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之间既有激烈的争论,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性别差异”一直是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派别都是从批评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提出“解剖即命运”的观点出发阐述自己理论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母婴关系似乎是一个能够把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联系起来的关键性课题,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母婴关系不仅是最原初的人性形式,也是任何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同时它对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研究母婴关系的意义、对象关系理论和符号学对于母婴关系的解说,以及母婴关系——一个未决的问题四个方面探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关于“母婴关系”的理论及其贡献。

## 一、研究母婴关系的意义

在当代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理论中,母婴关系是女性和女性主义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因为这一关

系无论是对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sup>①</sup>,以及儿童的心理发展,还是对于性别身份和主体建构,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说来,研究母婴关系问题主要有五方面意义:其一,有助于说明个体身份的形成。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苏珊·赫克曼(Susan Hekman)强调,人们的身份可以分为两种:私人身份和公共身份,前者是在儿童期形成,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后者反映出一个人的群体身份,这些群体或者是他自愿认同的,或者是被其他人安置其中的。而母婴关系对于人们私人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儿童的私人身份实际是他早期对母亲关系体验的反映,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儿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持续性的核心自我,但赫克曼并没有明确地探讨这种私人身份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一些私人身份能够妨碍政治和社会行为,而另一些则可以促进和鼓励这些行为的问题。其二,有助于解释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性别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通过自己对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儿童与母亲最初建立的关系将为日后的所有关系提

\* [收稿日期] 2013-4-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伦理学思想史的女性主义解读”(12AZX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精神健康问题的伦理学研究”(12YJAZH163)。

[作者简介] 肖巍,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供模式。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 (Melanie Klein) 也认为, 儿童在婴儿期获得的情感体验将影响他们的一生, 即便在长大成人后, 人们在生活中仍继续表达着与其母亲的内在关系。母亲从两种不同的途径为孩子建立起自我: 为他的心理整合提供所需要的体验, 使得一种根本无法统一的自我成为可能; 为婴儿提供可供内射的完整对象关系, 并构成婴儿人格核心的样板式人物。<sup>[1] [P78-79]</sup> 此外, 母婴关系也对成年人的性别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 儿童成年后对于女性的负面态度, 女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在被尊崇与被贬抑、被崇拜和被憎恨之间轮换和徘徊的地位也来自于母婴关系, 例如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多萝西·狄纳斯坦 (Dorothy Dinnerstein) 看到, 人们在婴儿期的中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母亲, 在婴儿有能力分辨自己的五官, 区分出内外、以及自我与他人之前, 母亲是被爱的, 也是被恨的, 因为她既满足婴儿的需求, 又拒绝他的需求, 即宠爱他又忽略他。这种与母亲/女性的早期紧张关系对婴儿的未来影响深远,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在心灵中的某个隐蔽的角落里, 往往还保持着童年不合逻辑的印象, 把女性视为“它”而不是“她”, 而“它”就像自然和肉欲一样危险和难以驾驭。由于母亲在我们幼儿期具有强大的支配力, 所以无论男女都对女性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恨, 而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恐惧和憎恨。<sup>[2] [P6]</sup> 其三, 有助于说明女性的欲望与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美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杰西卡·本杰明 (Jessica Benjamin) 认为, “现代语言学和精分析告诉我们: 从深层意义上讲, 不是我们操纵语言, 而是我们被语言操纵。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女性’是男性话语的结果。西方文化历来不把女人看作语言主体, 女人不是被界定为无道德就是被认为是无欲望的客体。”<sup>[3] [P49-50]</sup> 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 女性欲望一直是一个谜团。弗洛伊德曾发出一种慨叹: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被解答, 纵然我研究女性的灵魂达三十年之久, 我仍然无法回答, 这个问题便是: 女性想要什么?”<sup>[4] [P47]</sup> 于是, 弗洛伊德便采取两种简单和错误的方式——把女性“自然化”和“神秘化”来回答女性问题。就前者而言, 在解释女性心理学时, 他坚持一种“解剖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 认为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解决俄狄浦斯情结, 因为她们没有“阉割恐惧”和“阉割焦虑”, 所以无法发展起强大的“超我”, 她们的心理发展明显落后于男性, 易于表现出情

绪化的倾向, 缺乏正义感, 不愿意接受生活的要求。就后者来说, 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把自己从研究男性那里得出的数据准确地应用到女性身上, 因而便把女性的心理比喻成一块“黑暗的大陆”, 尽管他相信女性也有某种本质, 但他却感到这种本质让所有的逻辑构思都无法运作。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试图解构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父亲的神话, 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先于任何话语方式的性别欲望和主体, 主体的诞生是从婴儿时期模仿双亲开始的。由于在西方文化中, 母亲或是以圣母的方式, 或是以被动的、男性欲望客体的方式被界定的, 所以女孩也会模仿母亲复制父权制的话语和文化结构, 因而必须从母婴关系, 尤其是母女关系入手破除父权制话语结构, 说明女性的欲望, 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其四, 有助于促进女性主义道德认识论的发展。在对两性道德心理发展的研究中, 卡罗尔·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也试图通过强调“关系”来发展女性主义道德认识论, 说明女性的认知方式和推理如何与其养育子女的实践相联系, 并认为由于养育方式的差异, 女孩的自我边界似乎更具有渗透性, 更关心如何维持关系, 这可能为与性别差异相联系的不同推理方式提供说明。<sup>②</sup> 而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南希·乔多罗 (Nancy Chodorow) 则更为直接地指出, 当精神分析理论出现认识论差异时, 主要应当考虑母亲、母婴关系、性别与异性恋问题。其五, 有助于说明社会、宗教和文化的起源。在法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看来, 母婴关系不仅是最原初的人性形式, 也是任何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在母婴关系中形成的“爱”的体验是母婴融合的共同体验, 所谓“爱”指的是意义的生成性, 爱产生出与被从自己分离出来的对象命题相关的意识, 并产生出表达主体、语言、符号象征意义的体系, 所以也产生了文化和历史。<sup>[5] [P253]</sup> 婴儿在对母亲的依恋中奠定个体与社会道德关系的基础, 尽管婴儿对于母婴关系的印象是极其模糊和混乱的, 但却是个体和人类道德的原型, 而母亲对于婴儿的爱则体现出爱的无条件给予, 这成为人类一切爱的根基。而且, 我们也可以通过母婴关系说明社会、宗教与文化的起源, 以及在这一起源中母亲/女性如何被厌弃 (abjection) 和“谋杀”。

既然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不仅对说明个体身份、主体地位、道德及心理发展, 以及性别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有助于解释人类社会、宗教和文化

的起源 那么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如何阐释这一关系便成为另一个必须首先面对的关键问题 在众多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中,本文仅尝试性地从对象关系理论,符号学理论入手探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关系的解说。

## 二、母婴关系:对象关系理论的解说

在精神分析领域,对象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对象”是弗洛伊德创造的术语,意指构成另一个人感情或内驱力的对象或目标的有特别意义的人或事物。<sup>[6][P1]</sup>而对象关系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探讨母亲与婴儿的早期关系,说明这一关系如何塑造儿童的内部心理世界和日后的成人关系,它也可以提示过去的心理遗迹,并塑造出当下与他人互动的关系模式。

对象关系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在于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与生物学相关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对弗洛伊德“解剖即命运”的生物本质论提出质疑,更为积极地建构心理发展模式,突出母亲,而不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意识到人性依据社会关系来变化的事实。同时,这一理论也可以帮助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发现女性被压抑的体验,分析人们通常压抑了什么样的体验,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压抑,回答什么样的扭曲被纳入到女性的思维结构之中,以及权力关系如何进入个体人格等问题。在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家中,有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克莱因、乔多罗和珍妮·弗拉克斯(Jane Flax),她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母婴关系,强调母亲的核心地位,并用这种关系解释人类性别差异意识的起源,说明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关系,解释女性的认识方式和性别不平等的起源等问题。

首先,克莱因第一个修改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内驱力模式,将人际环境作为影响人格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启发人们从人际互动,而不是从生物本能角度看待母婴关系,为精神分析从“驱力结构模式”转化为“关系结构模式”奠定基础。然而,她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革命并不彻底,例如她仍旧为本能内驱力保留了位置,从内驱力角度将婴儿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通过幻想转化和呈现的关系,这也是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把她视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先驱者,而另一些人则对其理论中的弗洛伊德成分进行激烈批评的原因。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里奇蒙(Sarah

Richmond)曾对克莱因理论的“弗洛伊德倾向”提出颇有见地的解释,认为尽管克莱因从弗洛伊德理论出发,但她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其他男性中心的倾向,真正地反映出她作为一位女性和母亲的看法,例如她把母婴关系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削弱了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占居首要地位的“阳具妒忌”成分;她的“对象关系”理论强调一种或多种被内在化了的人际关系,认为是这种关系逐步地构成自我的核心,为个体身份形成的“关系论”解说提供一种实证说明,此外,她关于道德意识基础的假设也促进了道德起源于熟悉关系的解释,同时,她关于在婴儿发展中母亲角色的说明也肯定了母亲劳动的价值。因而,即便克莱因同弗洛伊德一道相信“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具有“心理上的影响”,她的“解剖学”也是女性的。<sup>[1][P71-72]</sup>不仅如此,克莱因还强调了母婴关系对于儿童道德发展的意义。克莱因认为,在婴儿早期的发展中,母亲不仅影响婴儿的心理整合程度,也影响他们道德感的发展。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婴儿要经历了从偏执狂——精神分裂状况,再到抑郁症状况的转变,母婴关系也随着这一转变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婴儿对于母亲幻想(phantasm)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婴儿内化的正是母亲的照顾,如果发展是正常的,母亲便帮助孩子形成自己的人格,成为其人格核心的榜样人物,即便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在生活中仍会继续表达着与母亲的内在关系。<sup>[1][P75-79]</sup>克莱因还基于母婴关系,从人的嫉妒、进攻性和挫折等情感体验,从对于暴力和恐怖的幻想,以及内疚和焦虑,害怕伤害自己所爱的对象等情绪反应说明人的道德感的来源及其心理基础,并把这一过程与婴儿道德自我及其性别身份的发展联系起来。

同克莱因相比,乔多罗的研究则更为具体,她集中探讨了母婴关系中的性别身份问题,她从内在能动性角度说明母亲身份如何被不断地复制,母亲如何塑造出新一代的具有母亲心理倾向的女性,以及不具有这种心理倾向的男性,说明这种性别身份如何产生于母婴关系之中。同克莱因一样,乔多罗也始于弗洛伊德对于男女儿童性心理发展的说明,关注不同性别婴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关系中形成的不同“对象关系”体验,认为在这一阶段,所有婴儿都象征性地依赖自己的母亲,把她看成是万能的。然而,母婴关系也是矛盾的,因为她有时给予得过多,她的出现是压倒一切的,而有时也给予得太少,她的缺席是令人失

望的。对于男孩来说,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强烈亲密关系以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而告终,通过这一过程,他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爱恋对象,以便逃脱被父亲阉割的命运。他朦胧意识到权力和地位是通过与男性——在这种情况下的父亲的等同获得的。通过把自己的欲望交付给“超我”(集体社会意识),男孩最终与文化充分地融合起来。同父亲一样,他也排斥了自然和女性。而女孩的情况却不同,由于她没有会丢失的阳具,便很少与自己第一个爱恋对象完全脱离,因此,她继续保持着自己在前俄狄浦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不能与父亲所代表的文化进行充分的融合,而始终存在于文化的边缘地带。乔多罗认为,母亲与女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关系以更持久的共生为特点,在女性的发展中,这种关系从未中断过。但是,不同性别的儿童在后来的发展都会由于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婴关系”的影响在自我和道德发展方面遇到困难,对于男性来说,问题更多地出现在亲密关系中,而对于女性来说,问题则更多出现在个体性和关系解体方面。对此,乔多罗给出一个在女性主义阵营中颇受争议的出路:即治疗男性过分个体化,而女性过分联系化的方法是在婴儿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前俄狄浦斯阶段,要由父母共同照料子女,以便消除儿童性别身份中的不平等成分,打破男女儿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形成日后理想的性别平等关系,这种看法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与前两位学者不同,弗拉克斯侧重于研究婴儿在母婴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否定和压抑,认为这一问题在心理学和道德发展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压抑才构成人们日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婴儿早期体验到的压抑与社会对于母亲/女性的压迫紧密联系。在她看来,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意义,如果哲学家承认前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时期的危机体验,这些体验就会成为他们哲学的组成部分,纠正仅仅关注分离和个体化的世界观,恢复崇尚共生现象和联系的世界观。然而,西方男性哲学家一直不敢面对下列问题:(1)自己最初与母亲共生的现象;(2)由于与母亲分离,以便更像父亲带来的创伤;(3)重新体验与母亲共生关系的欲望。<sup>[7][P197]</sup>弗拉克斯指出,调整这种事态的方法是借助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重新思考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哲学家必须停止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早期体验,

必须产生人类应当互相依靠和互惠的观念,在不使差异“转化”为尊卑贵贱的情况下,以差异来取代二元对立思维。

总起来看,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有五个要点:其一,人类婴儿的心理出生并不随着身体的出生同时发生。心理出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身体和精神的相互作用,大体上在出生后三年中完成,这一观点对于弗洛伊德“解剖即命运”提出挑战。其二,心理出生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并通过社会关系发生,而母婴关系在婴儿早期的心理发展中至关重要,这一关系也是其他社会关系,包括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反映。由于母亲把个人体验和社会关系体验都融入与婴儿的关系之中,因此阶级、种族和父权制也都会融入婴儿的早期发展中。其三,性别身份并非是中性的,意识到性别也意味着认识到不同性别在社会地位和权力方面的差异,这继而影响到婴儿日后的性别身份及性别关系。其四,婴儿早期在母婴关系方面的不同体验并不随着发展而丢失,而是继续对他成年后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性别关系产生影响,即便在日后的发展中,人们可以改变对于这种体验的评价,却永远无法改变体验本身。其五,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婴关系对于儿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因而,无论是在精神分析还是伦理学领域,都应当重视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以便纠正在个体和人类社会发展仅仅关注分离和个体化的倾向,恢复崇尚共生现象和联系的世界观。

### 三、母婴关系:符号学的解释

如果说英美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家更为关注从个体身心和道德的发展角度研究“母婴关系”,那么法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则更多地强调“母婴关系”对于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人类学意义,把个体精神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起源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在解构父权制精神分析理论的同时,强调母亲/女性和“性别差异”对于个体道德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在探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时,曾提出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人类生活的宗教维度是什么?为什么在各种宗教传统中,普遍地存在着献祭牺牲(sacrifice)的现象,她认为这一现象是大多数社会形成的根基,而献祭牺牲“是使社会空间得以存在的一种宰杀”。<sup>[8][P67]</sup>伊丽格瑞的这种看法无疑地受到当

代法国文学评论家、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德(Rene Girard)对于文化、社会和暴力起源研究的影响,在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中,吉拉德试图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特点,他认为小说家在描述人物时会以“心理规则”来把握基本现实的结局,这种规则即是“欲望的模仿特性”。在他看来,我们对于某一对象的欲望最初是从他人那里借用来的,人们总是从构成我们榜样的另一个人对于某一对象的欲望中产生自己的欲望,因而主体与所欲望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榜样形成的一种三角关系:主体——榜样——对象。榜样在这里扮演欲望媒介或者中间人的角色。然而,当一个人总是通过另一个人的欲望而欲望某种对象时,榜样便成为一个对手或者实现欲望的障碍,继而主体在追求占有所欲望对象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妒忌和暴力,即便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秩序,也肯定是先前危机的结果,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很快忘记所欲望的对象,而把模仿的冲突演变成一种普遍的敌意。在敌对的危机中,对手之间便不再彼此模仿对于某个对象的欲望,而是相互仇视。如果说以往他们试图分享同一对象,那么现在他们想的却是摧毁同样的敌人。于是,如果他们之间不能发生直接的暴力冲突,所爆发的暴力情感就要集中在一个替罪羊身上,他们需要野蛮地除掉替罪羊将缓解群体的暴力,带来短暂的平静。吉拉德的这一理论提出了一个暴力起源过程的人类学假设,他不仅把这种情绪看成是原始宗教的起源,也视为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起源。然而,尽管伊丽格瑞赞同吉拉德关于献祭牺牲和暴力促进人类社会形成的理论,但却认为这一理论尚有不足之处,即没有解释女性在这种牺牲中的位置。伊丽格瑞认为在各种宗教传统中,这种牺牲并不是性别中立的,她试图探讨性别在各种献祭牺牲和社会形成理论中的意义,探讨作为牺牲者的替罪羊得以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她认为在替罪羊选择和仪式形成中,女性始终都保持在一个惰性的身体内,并由于文化的联结而丧失能力。<sup>[8] P68</sup>但伊丽格瑞并没有把这一研究深入下去,因为她只是意欲寻求一种对于女性不那么敌对的文化,以便“解决话语中女性的明确表达问题”。而克里斯蒂娃则延续了伊丽格瑞的这一研究,她的重要理论出发点是符号学,因为在她看来,符号学关系到儿童在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发展。她不仅试图从个体发生学和主体形成角度探讨“母婴关系”,也把它纳入到人类文化和社会起源的总体框架中。弗洛伊德认

为,在俄狄浦斯阶段,父亲、母亲与子女呈现出一种三角关系。他也设想人类和个体精神发生于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重结构之中,相应地要接受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审判。在这里,母亲与本我、父亲与超我、孩子与自我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自我和超我在发生学上都是由本我分化而来的。弗洛伊德的这三个审判后来被拉康发展为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区分,分别可以通过 $a - a' - A$ 来代表, $a$ 是小写的他者,是母亲的身体和欲望的对象, $a'$ 是孩子,而 $A$ 则是大写的他者,相当于父亲之名、语言和秩序。而“前俄狄浦斯是从尚未出现自我、超我的混沌的本我到产生出自我最初轮廓的过程,如果用拉康的观点就可以说是在连接 $a$ 和 $a'$ 的线上,从 $a$ 和 $a'$ 的分离以前到产生分离萌芽的过程。”<sup>[5] P202</sup>显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关注点是俄狄浦斯阶段,而克里斯蒂娃则试图从前俄狄浦斯阶段着手对母婴关系进行研究,把父亲原理(符号象征态)登场前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看成体现母性原理的前符号态,并从这里出发追溯语言和社会的形成,以及对于母亲的暴力。

在《恐怖的权力——论厌弃》一书中,克里斯蒂娃分析了个体在主体和性别身份建构过程对于母亲/女性的厌弃,认为这一过程与社会被建构的过程是相同的,个体和文化正是通过对于母亲的暴力/厌弃才得以发展和存在。在她看来,厌弃是一种厌恶的排斥之感,使人强烈地抗拒外在的威胁,因为它也可以引发内在的威胁。厌弃既是主体的起点,也是主体形成的推动力。厌弃标志着主体的出现。主体起源于对于母亲身体的抗拒,因为如果不离开母亲身体,主体便无法形成。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母亲与婴儿最初处于共生共存的状态之中,主体与外界没有界限,克里斯蒂娃把这种融合状态称为“主体的零度状态”。婴儿的前主体是空虚的和自恋的,它把所有的力比多都提供给自身,所以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心理机制是第一次自恋,这与主体确立之后的力比多从对象返回到自身的第二次自恋有所不同。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厌弃不仅导致主体与母亲的分离,而且成为自恋的前提条件。“甚至在成为像什么的存在,‘我’成为我之前,就有了分离、拒绝和抗拒。就其含义扩展到包括主体的历时性意义来说,厌弃是自恋的前提条件,它与自恋共存并使自恋成为一种永久性的脆弱。”然而,厌弃从何而来?在回答这一关键性问题时,克里斯蒂娃又回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道路上,借用了符号和语言中的

“父亲”角色。“另一方面,从我们个体的考古学意义上说,厌弃物使我们面对自己甚至在存在于母体之前,所产生的最早的与母体脱离的企图,这要归功于语言的自主性。”<sup>[9] P13)</sup>显然,这里的语言是符号性的,属于象征领域的,并由父亲所代表的。因而,在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尽管克里斯蒂娃试图克服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对于母亲的排除,但她依旧陷入拉康的陷阱之中,因为符号、语言都是属于男性的。

克里斯蒂娃也研究了原始宗教的暴力行为和人类文明发端中的“厌弃”行为,并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语言和文化符号都是围绕着对母亲的谋杀建构起来的。”“一方面,厌弃物使我们面对那些脆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游荡在动物的领地。因此,通过厌弃的方式,原始社会标志出一个准确的自身文化领域,以便使自己摆脱动物世界的威胁或兽欲,这里被想象为性和谋杀的再现。”<sup>[9] P12-13)</sup>在这里,母亲显然成为厌弃物的化身,相当于吉拉德在解释献祭牺牲和暴力时的“替罪羊”。只有排除被厌弃的母亲,社会空间才得以存在,群体的嫉妒和恐惧之心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宗教、文化和语言才得以出现。因而,在哲学、伦理和宗教中,与性别/女性/母亲相联系的净化(厌弃、排除和谋杀)及其仪式始终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就哲学是一种伦理学和不能被忘记的柏拉图来说,净化似乎是哲学的一种内在的关切。”而且,“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存在一种性别话语,它不是知识话语,却是唯一可能被净化的话语。”<sup>[9] P28-29)</sup>或许是黑格尔更为具体地提出应当在社会和历史行为中消除来自性和性别的不洁。对于宗教来说,解决厌弃问题的方案便是污秽、禁忌和原罪。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关系的神圣与献祭牺牲来自对于父亲的谋杀,人类社会起源于两个禁忌:谋杀与乱伦。“我们都熟悉弗洛伊德有关弑父的论断,熟悉他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提出的一个更为具体的观点:与犹太教相联系,古代原始部落的父亲和首领被他们的儿子串谋杀死,后来后者对于这一完全受模糊情感支使的行为怀有一种犯罪感,最终想恢复父亲的权威,这不再是以专横的权力,而是以权利的方式,因此他们转而放弃了拥有所有女人的做法,一举建立起神圣、异族通婚和社会。”<sup>[9] P56)</sup>而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弗洛伊德在这里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神圣一方面建立在谋杀和负罪感基础上,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衬里”,它更为隐秘和不可见,更无法表述,指向那些不稳定的、不确定的身份空间,指向

来自远古的双重脆弱性——威胁与融合,指向主体与客体尚未分离,语言尚未形成,但已经编制出恐惧和排斥的状态。因此,克里斯蒂娃更关心的是:在主体性之中,在符号竞争中,与“女性对抗”的暗示,以及社会为了尽可能陪伴话语主体完成这一行程的编码方式。她把这一行程看成“厌弃,或者结束黑夜的行程”。在考察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研究时,克里斯蒂娃赞成她把主体维度引入宗教人类学的思考,认为对于道格拉斯来说,净化是与边界、边缘和秩序相联系的因素。宗教仪式是一种净化仪式,通过对于肮脏、污秽和乱伦的禁止,划清了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界线,使社会得以成立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得以形成,母亲却被谋杀。“这些宗教仪式的功能是消除主体对自己身份不可挽回地陷入母体的恐惧。”<sup>[9] P64)</sup>因而,主体、符号和语言、宗教与文化,以及社会都是围绕着母亲被谋杀,以及谋杀者的利益建构起来的。暴力起源于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之中,当我们追问“什么”和“谁”在语言和文化的幕布之后隐藏起来时,便有可能看到谋杀者的真实面目。克里斯蒂娃试图通过对于母婴关系的解说,以及婴儿对母亲的厌弃来说明主体和社会文化的形成,并最终追求以新的视角研究女性与社会符号秩序的关系,把女性从作为“替罪羊”献祭的牺牲状态中解救出来,建立一种新的伦理秩序。

#### 四、母婴关系:一个未决的问题

在精神分析领域,母婴关系既是一个未决的问题,也是一个难解之谜,它所引发的问题域越发地深入和宽泛,并已经成为女性主义伦理学、精神分析与“父权制”学术堡垒对峙的重要阵地。应当说,所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在研究母婴关系时都怀有一个目的,即试图颠覆,抑或调合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分析学在性别身份、主体形成、社会文化和语言发展过程中对于父亲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强调,并在这一过程发展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使其能够对于人类和个体道德与文化发展产生不同于以往理论的积极影响。

总体上看,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关系”的探讨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突出“性别差异”的意义,这在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那里尤为明显。对于她们来说,性别歧视不仅植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之中,也来自文化、语言和哲学本体论框架。因而,人类不

仅需要社会革命,也需要在哲学领域进行一场基本范畴的革命,因为在哲学领域,话语主体一直是男性的,无论在理论、道德和政治上都是如此,而且在西方社会,上帝作为每一个主体和话语的保护者,其性别也总是男性和父系的。借用大陆精神分析学的丰富资源,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进行哲学话语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因为在她们看来,“尽管采取了模糊的、隐藏的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弗洛伊德还是说明了某种一直产生影响的东西——构成任何科学和每一话语逻辑基础的无差异的性别。”“弗洛伊德所有关于女性性别的陈述都忽略这样的事实——女性的性别或许可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sup>[10] P69</sup>因而,法国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来阐释“性别差异”,因为在传统哲学中,“主宰哲学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来自它把所有他者还原为同一性经济的力量。”<sup>[10] P74</sup>这种力量根除了“男性主体”自我呈现制度中的性别差异。而母婴关系则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强调“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口,这不仅是因为“母亲最重要的是把活力和女性特有的表象能力——所谓女性的文字语言——给予了女性,女性必须坚决恢复已经迷失的母性。”<sup>[5] P204</sup>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母亲和“母婴关系”的研究有可能为女性主义伦理学和人类的思维革命、为女性的解放和性别平等的追求,以及为人类社会的变革提供一条重要的途径。

其二,突出人类主体形成的动态意义,并试图在这种主体的形成中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从哲学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试图通过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从个体发生学角度探讨主体生成的过程。例如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在她看来,无论是柏拉图、笛卡儿等人倡导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还是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都把主体和语言看成同质的静止结构,而她的符号分析学则把语言视为话语主体的能动行为,这种能动性和话语无疑地是多元的和异质的,她也由此提出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主体哲学——过程哲学,并力图消除文化中对于母亲/女性的暴力因素,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

其三,突出身体和体验认识论的意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都试图以母亲和关于母亲的体验来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如果说近代以来的大陆哲学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要求从身/心或身

心出发抵达事物本身的话,那么女性主义的这种探讨也可以说体现出身体和体验认识论的特点。这正如波伏瓦一直强调的那样,“母性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化的体验”,女性自由的实现需要社会的革命。本文所讨论的克莱因、克里斯蒂娃等人都是通过自身做母亲的体验来研究精神分析学和母婴关系的。<sup>③</sup>而被视为在精神分析领域,最早运用自己与母亲关系的体验来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学者,弗洛伊德的关门弟子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根据自己在童年时代被母亲打骂的体验,坚信男女自恋的人格障碍是在认同母亲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导致的。<sup>④</sup>这些由于亲身或间接体验所产生的认识论成果无疑地对于人类精神和道德心理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四,把母婴关系置于个体发生学和人类文化、语言、社会以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之中进行研究。无论是对象关系理论还是符号学理论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都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法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更多地借鉴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的解读,以及他对于性别发展的符号学解释,同时也借鉴了诸如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使她们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显示出宏大的场景和历史的深邃性。同时,在大量的人类学、文化学和历史学,以及个体发生学研究基础上,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也有力地指出——以往的发展心理学认为母婴关系是非社会的,母亲与孩子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生活始于俄狄浦斯阶段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五,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也体现出女性主义的政治追求。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来说,研究母婴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追求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尽管在她们中一些人也常常陷入弗洛伊德或拉康等人的父权制理论“陷阱”,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其伸张女性权利,确立女性主体地位,保护女性利益,建构性别平等社会的政治追求。

然而,尽管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在对母婴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做出许多努力,但这一问题依旧是一个未决的问题,因为它包括着个体生命觉醒和人类文化起源的价值内涵,也承载着人类沉重的历史,预示着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所有精神分析学,以及文化理论一样,都是通过理论预设和概念化,以及人类关系体验来探求事实和真理的工具和方法论,而不是事实和真理本身,但即便如此,这一理论也

会给人们带来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 [注 释]

①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造成近3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5到10岁的儿童。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凶手亚当·兰扎在杀害其母亲后,又来到母亲任教的学校作案。当美国民众呼吁美国政府实行更严厉的枪支管制政策,并围绕着公民能否持有枪支,政府是否有权禁枪等问题争论不休时,笔者却认为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来讨论母婴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对于孩子日后的道德感和行为,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或许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②2012年出版的女性主义哲学著作《神经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与认知科学交叉中的问题》(罗宾·布罗姆等编,美国麦克米兰出版社)一书中,一些学者强调近十余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在道德思考方向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因而他们试图对吉利根的关怀伦理学提出挑战,但笔者认为,实证研究数据是依据文化、社会、人群和时间等因素而不断变化的,而且吉利根理论的意义如今,甚至在提出之目的也不是强调女性应当更多地具有关怀倾向,男性应当更多地具有公正倾向,而是提醒人们注意到在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和教育中,公正和关怀对于两性来说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③克莱因在做母亲过程中是压抑的,但她却用自己的这种体验研究儿童心理发展和母婴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对象关系理论。

④她发明了一个术语:as if人格。这种人格主要体现在认同短暂的人们身上,这些人大部分是精神病患者。这种人格的特点是不能够感觉到真实的感情,没有温暖的感觉,不能够建立持续的自我或超我认同。在媒体对

于美国康州小学枪击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及到凶手亚当·兰扎的人格障碍,因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会对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提供不同的思考路径。

#### [参考文献]

[1] Sarah Richmond.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Using Melanie Klein [A].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 Feminism in Philosophy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美]琳·马古利斯/多雷昂·萨甘. 神秘的舞蹈 [M]. 潘勋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 章国锋, 王逢振主编.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 保罗·罗宏·亚舜著. 弗洛伊德与女性 [M]. 杨明敏译. 台湾: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3.

[5] [日]西川直子. 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 [M]. 王青, 陈虎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6] [美] Michael St. Clair. 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于自体心理学 [M]. 贾晓明, 苏晓波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

[7] Nancy Tuana and Rosemaris Tong edited, Feminism & Philosophy, Westview Press, 1995.

[8] David Crownfield ed. ,Body /Text in Julia Kristeva\_ Religion, Women, and Psychoanalysi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9] 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_An Essay on Abjection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